

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第十六期：295-321（2003）

生態女性主義：連結性別壓迫與物種壓迫的女性主義觀點

Ecofeminism: Connecting Sexism and Speciesism

紀駿傑

Chi, Chun-Chieh

國立東華大學

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

副教授

電話：03-8630116

傳真：03-8636760

jjjih@mail.ndhu.edu.tw

摘要

「生態女性主義」(ecofeminism) 在 1980 年代開始興起於西方學界以來，即不斷的遭受來自生態陣營 (environmentalists) 與女性主義陣營的批判。前者認為生態女性主義模糊了人類對於自然壓迫的事實與焦點，後者則主要擔心生態女性主義將好不容易打出一片天下的女性主義倒推回女性本質論的泥沼。本文主要從回應一些女性主義者對於生態女性主義的 1) 二元論，2) 本質主義傾向之批判，來說明一個具有經濟與社會文化變遷觀點的生態女性主義，其實是拒斥二元論與本質主義的。本文並討論作為試圖同時解放物種壓迫與性別壓迫的當代思潮，生態女性主義著實是使女性主義能更深刻地處理這兩種相互支持的壓迫關係的重要論述與實踐取徑。本文並以「生物時間」與「生態時間」的概念，來討論在實際生活面向上，生態女性主義對於我們觀看性別—環境議題能有什麼超越過去女性主義者所提供的觀點。

關鍵字：生態女性主義、性別主義、物種主義、父權體制、生物時間、生態時間

一、前言

自從「生態女性主義」(Ecofeminism)一詞在 1970 年代被法國女性主義者 Françoise d'Eaubonne 提出，並於 1980 年代在英語世界開始受到關注與研究之後 (Sturgeon, 1997)，這個試圖結合女性主義與生態主義的新觀點便不斷地遭受到它試圖結合的這兩個學術傳統的質疑與挑戰。這其中，來自生態主義陣營的「深層生態學」(Deep Ecology)，以及來自不同派別的女性主義陣營可說是最主要的批評者。

「深層生態學」是由挪威的生態哲學家耐斯於 1972 年 (A. Naess) 所提出的。他認為一般人們所關心的污染與資源短缺問題，是以人類為中心

(Anthropocentric) 的「膚淺生態學」(shallow ecology)，相對於此，他提出了「深層生態學」的概念，主張將人類擺回環環相扣、相互依存生物圈之中，重新認識人類不過是地球上多樣生物共生中的一環，因而各物種間應具有平等關係，人類更應放棄以人為中心的思考方式與行為模式 (Naess, 1973)。換句話說，深層生態學者所批判的是人類過往所秉持的人類高於，並因此可以駕馭其他物種的「物種主義」(speciesism)，而它的終極理想，則是人類與其它物種的同時解放與共存。

相對於深層生態學的物種解放關懷，女性主義者最主要的關懷則仍在於人類社會本身，亦即目前仍普遍存在於許多社會之中的，在制度設計與觀念上認為男性優於女性（乃至於其它性別），在實質上造成性別壓迫的「性別主義」

(sexism)。「生態女性主義」者結合了上述兩項關懷，指出物種主義與性別主義兩者之間有著歷史、社會結構與邏輯上的關連性，因而尋求兩者的同時解放，乃是社會邁向更平等與進步的必要之路。然而，生態女性主義者這樣的信念，首先遭受到了許多主張「人類整體對於其它物種的壓迫才是現階段最主要的關懷」之深層生態學者的批判，因而生態女性主義者與深層生態學者在 1980 年代開始進行了長期的文字交鋒。前者批評後者將自然被壓迫的現象理解為普同的人類（中

心)對自然壓迫之普遍現象,忽視了這其中父權意識型態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許多女性同為父權思想/體制壓迫自然之下的受害者之事實。深層生態學者則對生態女性主義陣營提出反擊,認為後者一來過度渲染了父權的作用,再者天真地認為一個平等的社會(尤其男女平等)便能解決生態與物種間壓迫的問題(參閱 Salleh, 1983; Zimmerman, 1987; Fox, 1989)。

作者認為,生態女性主義與深層生態學之間的辯論,非常有助於前者對於其基本主張的反省與釐清,也可讓不同的研究者更看清其面貌。然而,因為這並非本文的焦點,本文只打算從下文的論述中指出,深層生態學者對於生態女性主義的上述批評其實是基於錯誤的解讀,而生態女性主義學者也並未主張性別平等便能解決造成生態破壞根源的經濟擴張問題(李慧樞, 1991);他們所主張的是,同時面對與挑戰性別主義與物種主義,將有助於兩者的一起改善。本文最主要處理的內容,是有關第二部分,女性主義者對於生態女性主義的批判,以及後者的回應,並從而思考究竟生態女性主義的理論與主張是否能為提升女性主義做出貢獻。

生態女性主義在英語世界雖然已經有 20 年左右的歷史,但是在台灣,這方面的論述與研究仍然非常有限,其中李慧樞(1991)、顧燕翎(1997)、葉為欣(1998)、馮慧瑛(1999)、李常卉(2001)等研究者都已經針對生態女性主義的許多面向,以及在台灣的應用及發展可能性進行介紹與討論;本文不再對其做全盤性的介紹。取而代之地,作者試圖針對一些女性主義學者對生態女性主義之批評,以及後者所提出回應這方面的關懷,先對生態女性主義的基本主張進行一些討論。

二、生態女性主義的基本主張

在一篇試圖回顧生態女性主義的緣起之文章中, Spretnak (1990) 認為,我們可以追溯生態女性主義至三個不同的根源。第一是基進/文化女性主義,這些

女性主義者一方面受到馬克斯主義關於（階級）壓迫的影響，另一方面批判該主義的忽視自然與女性受壓迫的事實，並結合關於父權體制的研究，開闢了一條新的探討自然與女性面向的研究。其次的路徑是來自於以自然為基礎的宗教研究，尤其是研究「女神」方面。相對於日後發展出的男性一神宗教，女性主義者發現許多社會都有（多）女神崇拜的傳統，而且這些女神崇拜往往整體地（holistic）而非二分地看待天與地，靈性與物質，人與其它生物；女神則為孕育與撫育這一切的母親。而女神崇拜的式微，也代表著女性氣質、觀點與女性地位地被壓抑，因此重拾被埋葬幾千到上萬年的女神崇拜靈性傳統，被一些生態女性主義者視為女性與自然同時解放的重要途徑之一（Orenstein, 1990）。

生態女性主義的最後一個根源是來自環境主義（environmentalism）。正如許多女性在其行業所面臨的「玻璃屋頂」（glass ceiling）問題，1960年代的西方女性進入環境保護、生態保育相關之行業與非政府組織的人數往往多於男性，但她們卻發現男性往往佔據其中最重要的決策地位，而女性卻繼續擔任社會運動、非政府組織中的「秘書」、「打雜」等次要工作。再者，在美國許多專業的環保組織中，許多女性感受到她們的難以融入「男性文化」，以及她們關切的一些女性議題的不被重視（Gottlieb, 1993: 227-234），這些經驗都使得這些已經對綠色思潮、深層生態學、動物解放等具有相當豐富知識與專業/運動經驗的女性開始思考生態與性別之間的關連性。

不論她們的進入路徑為何，生態女性主義者最後聚合於對自然與女性地同被壓迫的現狀，以及他們的解放之關懷。雖然不同的生態女性主義者有著不同的重點主張，但她們的基本信念與關懷大致可以包括（但不限於）下列：

- 1、父權思想與其社會、經濟、政治、文化體制是造成男性對女性的性別壓迫之主因。
- 2、同樣的思想與體制也是造成人類壓迫其它「自然」的主因。
- 3、上述兩者之間有著社會邏輯與歷史的連結。
- 4、因此，性別的解放與自然的解放之間，有其社會邏輯與歷史的不可分割性。

在上述信念下，生態女性主義者也提出下列重要的觀察：

- 1、女性在父權體制下，往往被分派於從事人類生物性再生產（biological reproduction）以及和自然直接相關的工作之上（如飼養家禽、家畜，取得材薪、處理食物等），這使得女性**被認為**是較接近自然的。
- 2、早期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被二分地認為是逐步以人類「文化」（或「文明」）克服自然限制的歷程；因此「文化」是既高於且優於自然的。
- 3、在父權體制下，男性主導著主要的社會發展歷程，因而相對於女性，男性也**自認為**是較接近「文化」的。
- 4、上述發展，造成了「女性—自然」「男性—文化」的歷史與社會連結，而在文化高於自然的社會價值之下，男性高於女性的價值也被對應地建立了。
- 5、自此以往，各種女性特質（如：柔弱、感情、直覺）從人類共有特質中被抽離、二分化與背景化、貶抑化，並襯托出男性特質（如：剛毅、理智、抽象分析）的優越性。

生態女性主義者提出的這些主張與觀察，原本是為了翻轉父權體制下女性與自然同被宰制的命運，但是卻遭到了來自不同女性主義陣營的質疑與攻擊。作者認為，這些質疑與攻擊的最主要部分是相互關連的兩點：本質主義與二元論，而批評者認為這都是使女性主義向後倒退的因素。但真的是如此嗎？

三、生態女性主義：本質主義與女性主義向下沈淪？

(一)本質論傾向的批判與回應

西蒙波娃在她的「第二性」（1952）中，已經提到關於女性與自然的被連結在一起之「男性陰謀」現象。但最早提出有關女性—自然，男性—文化連結的系統性論述的學者可能是 Ortner。在她 1974 年的文章「Is Female to Male as Nature Is to Culture？」中，Ortner 試圖從 a.女性身體結構與功能（生殖、生育器官，經

痛，創造生命 vs. 男人的狩獵破壞/摧毀生命等)，以及 b. 女性的社會角色（生育、家務勞動、照顧幼兒等）來回答「為什麼女人被視為較接近自然」的問題。她並主張，女性在此文化價值下，被社會分派為擔任「中介/轉介自然與文化」

（mediating between nature and culture）的角色——不但不斷地從自然中取得、處理、轉化（由生而熟）社會所需的自然資源，更將「自然野態」的幼兒教化成「文化、有教養」的成人。然而，她一再強調，上述社會文化價值觀並非自然現象，而是文化建構的結果，女性並非「在現實上比男性更接近自然」（Ortner: 1974: 87）。

Ortner 在上述文章中的討論，引發了往後多年女性主義陣營中有關女性/男性與自然/文化之對比與二元論方面的討論與辯論，雖然本文作者認為，其中許多關於「本質論」的批評，其實是誤讀了作者的原意。MacCormack（1980）便批評 Ortner 一方面將男性氣質歸因於社會性影響，另一方面卻將女性氣質

（femaleness）歸因於生物性根源，這是犯了本質主義的謬誤。然而這樣的批評，卻是忽視了前文所提，Ortner 一再強調女性氣質主要是受文化建構影響的主張。

當然，女性在生理上甚至社會文化上的和男性不同，的確使得眾多生態女性主義者之中，有部分人的觀點具有本質主義的傾向，例如提出女性乃與於大自然的「大地之母」之觀念，因而引起批評（成令方，1990）。同樣的，Collard（1988）也主張，不論她是否親身體驗當母親，女性的這個生物性特質讓她成為真正的自然之子，也是她力量的泉源所在。Spretnak（1989）則是認為男性缺乏深刻的涉入生育與養育的過程，也未強烈地具備「彼此同心」之社群感，這可能使他們轉而關注於死亡（主要為戰爭），而非生命；女性則相對地因生養育經驗而使她們更重視生命。此外，一些生態女性主義者的書寫與論述，也讓人在未窺知該論述全貌的情形之下，感受到了「本質論」的陰影。Salleh 早期的主張便是一個例子：「男人必須更勇敢地重新發現並去愛存在他們內在的女人」，而女人只需「被允許愛她們目前的狀況」（Salleh, 1983: 345）。Sturgeon 甚至認為，美國生態女性主義先驅 King 的書寫裡所出現的本質主義觀點，其實是一種「策略性的本質主義」

(strategic essentialisms)，目的在於鼓舞女性的勇於組織動員，而其實她骨子裡是反本質主義的 (Sturgeon, 1997: 69)。

正是諸如上述的具本質主義傾向之論述，引發了許多女性主義者對生態女性主義的批判。在一次的訪問會上，西蒙波娃便再次強調他在「第二性」上的立場，覺得將生態與女性主義連結化使她感到不安，因為這兩者並非自動地相互關連。而她也認為此種連結將使女性從主要的女性解放課題中分神開來，轉而關注諸如生態、和平等次要的課題 (King, 1989)。批評火力更強大的，則是來自於社會生態主義陣營同時也是女性主義者的 Biehl。她同時質疑前述關於靈性、女神崇拜等論述，以及將女性與自然的連結，認為女性主義好不容易經過長久的打拼，才能有今天這樣 (能和男性平起平坐) 的理性與進步，但這些生態女性主義者卻著重於生物性特質的探討，以及女性與自然之間神秘性的連結，這種內容貧乏的論述與隱喻以及使用不理性比喻的作法，是在「邀請女人倒退一步」，回到人類意識中充滿著將現實神秘化的時代 (Biehl, 1991: 6)。換句話說，Biehl 認為生態女性主義的論述只會讓女性主義更向下沈淪。

然而，上述帶有本質論色彩的論述與書寫，只是眾多生態女性主義論述中的一部份，並非代表生態女性主義者的共同，甚至一般性觀點。同為生態女性主義者的 Mellor (1992) 便批評這種本質主義的觀點為「親和的生態女性主義者」

(affinity ecofeminists)，認為她們誤認女性與自然具有內在的關連性，她本身則試圖從物質主義觀點來說明性別與生態之間的關係是如何在歷史上與當代被建立的。New (1996) 則批評前述本質主義的觀點必然是悲觀的，因為如果女性「本質地」與自然相連，而男性「本質」卻又必然展現出父權體制，那麼我們便無法以女性文化來改變此父權文化的摧殘自然，除非是在一個由女性主控的社會之下，但在現實上，我們卻又提不出如何達到那樣子的社會的方法。然而，Cuomo (1992) 也主張，即使部分生態女性主義者有本質主義的傾向，我們也不至於需要將生態女性主義全盤的推翻 (否則便是犯了「一竿子打落一船人」的謬誤)；畢竟生態女性主義提出了許多分析精確且相當具說服力的關於女性與自然同被

壓迫之間的關連性之討論，而這些，以及它們的同時解放才是我們應該關注的面向。

(二)二元論傾向的批判與回應

其次，生態女性主義中出現的本質論說法，往往也脫不開具有二元論謬誤的傾向。在前述「女性較接近自然」的述說中，女性往往被說成具備「感情」、「柔弱」、「關懷」/「照顧」、「關係性自我」等特質，而相對的，男性則是具備「理智」、「剛毅」、「駕馭」、「強化的自我」等特質，似乎這些特質可以如此被二分，而且一種特質僅僅存在於兩性中之一。Cuomo (1992) 便舉了許多例子，說明一些生態女性主義者不自覺地落入了二元論的論證，並且造成和她們所主張的生態女性主義價值相衝突的狀況。

作者認為，本質論與二元論的確是作為長期被壓迫者試圖翻轉此壓迫情境時，極為容易落入的陷阱。在面對歐洲新殖民主義與文化同化政策時，非洲部分黑人領袖便提出了「尼格羅性」(Negritude) 的說法，標舉非洲文化本質之睿智與博大精深；奈及利亞詩人 Senghor (1993) 甚至主張超越西方當代哲學與科學思維的 Negritude 可以作為「二十世紀的人文主義」。而近年來有鑑於全球環境的急遽遭破壞，許多環境主義者亟欲以發揚「原住民生態智慧」來對照於非原住民社會的生態破壞性行為，這些都是屬於類似的行徑。只是，這種翻轉過去「彼優我劣」成「彼劣我憂」的說法，其實是延續了過去殖民壓迫者的邏輯，雖然可能可以一時感動人，但長期而言，由於缺乏實質與可行基礎，只會造成空洞的「精神勝利」，對於顛覆壓迫關係非但不能產生實質的功用，反而還可能產生負面效果 (Fanon, 1989; Milton, 1996)。

Plumwood 一方面也主張，我們需要一個「文化的生態女性主義」來重新對女性地位、陰性氣質、自然進行文化上的價值重定位，另一方面則警告我們不能落入在女人身上尋覓生態救贖的陷阱 (Plumwood, 1993)。她主張女性主義之所以必須關懷自然生態以及非人類物種的被壓迫等，諸多壓迫性結構的議題，主要

原因在於這些壓迫性結構支持並強化了彼此的壓迫關係，而其中自然的被壓迫與女性的被壓迫之間更是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她更清楚的勾畫了二元論的邏輯結構，指出女性與女性氣質如何被相對於男性、男性氣質的二分化、背景化、低下化、同一化等，最終透過了二分化與層級化區別出了高上的男性、男性氣質對於低下的女性、女性氣質的殖民（參見 Plumwood, 1993: 47-59）。

許多生態女性主義者指出，同樣的二元論邏輯，也出現在父權社會對於自然的壓迫關係之上，然而不論是二元論或二元論裡的階層關係，都是她們必須反對的。King 便指出，

地球上的生命是個相互交織的網……人類的階層關係被投射在自然身上並用於合理化社會壓迫。因此，生態女性主義理論試圖彰顯各種支配關係之間的關連性，包括對於非人類自然的支配，因此生態女性主義必然是反階層化的。(King, 1989: 19)

而在生態女性主義陣營中，最有效地指出上述性別與物種（人類—非人類）兩種二元論之間的相互支持與強化的人，大概非 Merchant 莫屬了。Merchant（1980）透過詳細的歷史研究，討論歐洲從中世紀以來，男性主導的現代科學與科技活動如何以機械式觀點將原本被視為有機、有生命的自然一步步地摧毀，而這過程又是如何地與男性透過「獵殺女巫」來對女性攻擊以及奪取女性原有的知識力量是相互輝映的。最終，歐洲的科學革命帶來了新的、斷裂/破碎化與原子化的宇宙觀，也確立了男性的主宰地位以及「自然之死」。

本文作者認為，我們無法否認在當前絕大多數社會中，女性與非人類自然之間的確存在著較為緊密的互動關係，但是我們一方面必須更細緻地區別不同社會文化型態中的女性，她們與自然的「較為緊密」的關係也有著層度上的差別；同時將這樣的差別，以及女性的可能逐漸遠離自然，放在一個社會生產方式/經濟型態與女性社會位置改變之社會變遷的脈絡來理解。Plumwood（1993：35）認為，提到女性與自然的關係時，我們不需要用本質主義的觀點來理解，而是將這兩者的關係擺在女性不同的社會與歷史關係裡來認識。當然，這也就隱含著，隨

著女性在不同社會的歷史發展歷程中社會位置的改變，她們與自然的關係也會跟著改變。有了這層認識之後，有關本質論、二元論以及許多批評者認為生態女性主義中出現的問題與疑慮便可以迎刃而解。

（三）跨越本質論與二元論的迷思

環境社會學者 Milton (1996) 在研究一些狩獵採集社會與自然的關係之後，舉出了一些不同社會看待與對待自然的不同方式。他指出，對一些社會而言，大自然是個「給予」的大地之母，人們只要花少許的精神時間，便可以接受到這些大自然的給予。另有些社會則視自然為被動的給予，人們必須努力的工作才能從大自然取得所需的食物與其它資源。再者，一些社會也視自然與人類之間的關係是互惠的，人類從大自然取得資源，但是必須回報給自然，資源才會生生不息地供給人類；這最清楚地反映在一些社會的舉行祭拜自然儀式，或是留下供奉物給大自然之現象。

在人類社會還過著依賴自然的「給予」而過活的狩獵採集生活型態時，男人與女人往往同樣與自然保持著密切的關係。然而，在許多社會隨著男人—狩獵者的地位逐漸提高、男性漸次地掌控摧毀生命的武器与其它社會資源之後 (Mies, 1986)，男性與女性和自然的關係也開始產生了變化：前者逐漸減少與自然直接互動的活動，而後者則仍然保持著一定的與自然的互動關係。然而，隨著 Mies 所說的「父權與資本積累」體制地不斷擴及全球各地，即使在（後）工業社會的女性，她們與自然的互動也逐漸減少了——雖然她們往往仍然透過扮演「生育」、「養育」與「撫育」的角色，而對周遭環境的健康與否比男性還多具敏感度。

我們可以做出這樣子的結論：愈是工業化/後工業化的社會，不但男性愈遠離自然、愈對自然缺乏敏感度，女性也逐漸變得如此。這除了女性也不再密切地與非人類社會環境的「自然」互動之外，還因為女性也透過現代科學教育、勞動市場、消費文化等影響而受到 Merchant (1980) 所說的以機械觀認識自然，以及其它父權社會文化和後/工業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結構影響之結果。Shiva (1993)

所說的「大地之母的陽剛化」(Masculinization of the Motherland)是個很貼切的說法，雖然她談的是南亞過去半個世紀逐漸遭遇的狀況，但後/工業化社會只是更早於南亞被「陽剛化」了。瞭解了這點，我們就可以明白為什麼絕大多數身處西方國家的生態女性主義者，她們最津津樂道的例子，卻都是發生在非西方、非工業化地區——肯亞婦女為阻止土地漸次沙漠化以及為增加材火來源而發起的「綠帶」(Greenbelt)種樹運動，以及印度北部婦女環抱樹木以防止它們被砍伐的 Chipko 運動等 (Shiva, 1989)。當然，這不表示工業化社會的女性便沒有值得生態女性主義者讚揚的例子。

在西方社會以及許多新興工業社會中，有很高比例的女性已經加入了各種的工、商、服務等生產行業，雖然她們仍身兼主要的家務勞動工作，但是這些工作已經很少是直接與其它生物與生態體系的接觸。即便如此，這些地方的女性仍透過性別社會化教育的長久性影響，以及「母職」的行使（例如擔心身體脆弱的小孩受害），而使她們往往對於環境破壞的敏感度高於男性 (Gottlieb, 1993)。當代對美國有毒廢棄物管理與政策造成深遠影響的「愛渠」(Love Canal) 事件社區動員領導者，原本為家庭主婦的 Louis Gibbs 便是代表性人物之一，雖然她本人並不一定自認是「生態女性主義」者。同樣的，1980 年代初在英國由一群婦女長期駐紮於美國空軍基地外來抗議美國的部署巡弋飛彈的「Greenham Movement」也並非偶然，許多婦女正是因為希望她們的子女以及孫子女能活在一個和平、無戰爭與毀滅威脅下的生活挺身而出的；而她們的行動也被許多女性主義者視為女性團結組織起來，挑戰（男性主導的）會導致大規模環境災難的武器競賽活動之典範 (Cook and Kirk, 1983；Gottlieb, 1993)。

因此，西方工業化社會以及新興工業化社會女性所關心的環境議題，必然是以「污染」這個直接對人體、生活安全造成影響的議題居多，而「南方」國家女性，尤其是非居住於都市地區之女性則較多會關注於樹木、土地、其它生物、資源與生態系統等「自然」現象，因為這些都與她們的日常生活——薪火取得、魚獵採集、作物種植等息息相關。不過，我們也可以預期，如果這些「南方」國家

也逐漸進入「父權式的資本積累」狀況時，這些地方的多數女性也將步工業化、都市化國家女性的後塵，逐漸減少與自然的直接接觸，因而也將減低她們對於自然環境的敏感度。將女性與自然的關係置於這種歷史變遷與女性社會位置改變的脈絡之下，我們便一方面能避免「女性必然較親近自然」的本質主義與「女性之於自然就如男性之於文化」的二元論的謬誤了。

上述觀點，同時也是生態女性主義者避免落入「西方中心」思維的重要途徑。由於截至目前為止，生態女性主義學者主要都來自西方學界，而其中她們部分的論述，出現以西方社會歷史文化來解讀/應用到全球人類社會的問題（成令方，1990；Li, 1993），以及任意拼貼其它文化價值與現象來成就普同性的生態女性主義理論的問題（Gaard, 1993），因而遭致批評。將女性與自然的關係，放在上述的因著不同的生產方式與型態而產生變化之脈絡，如此才能避免將西方經驗吸納或過度詮釋非西方經驗的問題。當然，這其中不同社會文化之間的差異也是必須小心察覺與值得深入進行研究的，不過這並非本文的主要關懷，因此在此不擬繼續深入討論。

四、解構壓迫性概念結構

上文所討論有關強調女性與自然的連結雖然容易犯了本質主義的謬誤，然而對 Plumwood（1993）而言，一些女性主義者極力批評並亟欲擺脫這種女性與自然連結的意象甚至「束縛」，也是落入了人類/自然二分與父權體制壓迫觀念系統而不自知，這是生態女性主義者必須顛覆與翻轉的。Plumwood 正確地指出，隱含於批評女性與自然的連結是「女性倒退」、「對女性的污辱」的背後，必須基於認定「自然」是次等、低下於人類的。然而這樣的觀念，正是人類（尤其當代父權體制）對於其它自然世界的二元對立、背景化等壓迫系統的一部份，是生態女性主義所必須反對的。

早期美國白人殖民者從東岸往西岸「開發」（從原住民與生態的角度來看，

其實是破壞與殖民壓迫)的歷程中,喊出了「印地安人與樹都必須被砍倒」,進步的腳步才能大步向前邁開之口號(Chomsky, 1993),便是將印地安人(當代正確的稱呼應該是「原住民」)比擬為代表物種道德層次低下、需被道德層次高的人類「文化」征服的「自然」。同樣的,1930年代日本佔領中國上海期間,上海的公園門口「中國人與狗不准進入」的告示,被認為是對中國人極大的侮辱,其前提也必須是中國人視狗為比人低下的動物(因而「豬狗不如」一句才構成「罵人」的效果)。當然,姑且不論狗看到這個告示時的想法,這個告示若看在今天許多寵狗人士眼中,恐怕他們的憤怒是來自於竟然他們尊貴、忠心的愛犬竟然被並排於相對於狗更為虛偽、狡詐、有些還吃狗肉的人類了。質言之,女性被類比於自然,被認為是對女性的貶抑之想法,必須建基於「自然」為「差人一等」甚至「低下」之價值,但是這樣的價值,正是生態女性主義所必須致力挑戰與顛覆的。

因此,我們可以說,女性由於長期受到父權體制之下社會制度性安排與性別社會化的影響,在不同的社會中往往擁有著不同的,相較於男性與自然更為緊密的關連性(因而也較會關切環境相關議題),這關連性絕非源自於女性的「本質」,因此也會隨著女性受到歷史、社會變遷的影響而有所改變。然而,指出甚至強調這個關連性絕對不是使「女性主義向下沈淪」的力量。相對的,生態女性主義的重要任務便是一方面是與生態主義(如深層生態學)相同的,必須翻轉人類社會視自然為低下且必須加以控制或可以任意行使人類意志的相關價值;另一方面則是與其它眾多女性主義派別之關懷相同的,必須改變父權社會中對於女性與陰柔氣質/文化的壓迫。更重要的,生態女性主義也必須持續地關注上述兩種壓迫關係之間的關連性,例如將一塊未經人類開發、利用的土地稱為「處女地」,其背後的意識型態便是同時主張與合理化男性對女性、人類對自然的駕馭,這便是生態女性主義者所必須指出與試圖改變的。在這個面向上,Warren(1990)提出的「壓迫性概念結構」(oppressive conceptual frameworks)觀點有助於我們對問題的釐清。

Warren 主張「壓迫性概念結構」包含了三個主要的特性：1) 價值層級化思維——將東西、生物做一番價值高下的排序。2) 價值二元論——將兩兩一組的東西、生物視為斷裂的區別而非連續、互補的，並因而區分出兩者價值的高下。3) 一套壓迫性邏輯論述。Warren 提出了兩組的壓迫性邏輯論述：(A) 人類支配、壓迫自然，以及 (B) 男性支配、壓迫女性；而重要的是這兩者的邏輯結構是相同的。

第一組的邏輯結構是建立在以下五個信念與宣稱：(Warren, 1990: 129)

- (A1) 人類具有，而植物與石頭並不具有有意識地、重大地改變他們所居住的環境之能力。
- (A2) 只要是具有有意識、重大地改變他們所居住環境的東西/生物，他們在道德上便是高於不具這些能力的東西/生物。
- (A3) 因此，人類在道德上是高於植物與石頭的。
- (A4) 對於任何的甲和乙，假若甲在道德上高於乙，則甲便具有支配乙的道德正當性。
- (A5) 因此，人類具有支配植物與礦物的道德正當性。

上述邏輯思維主要依附於 1) 道德高下宣稱 (A2)；2) 道德高下合理化支配行動宣稱 (A4)，因此，道德高的人類才可以「理所當然」地支配與剝削道德低的非人類。同樣的，女性被男性支配的正當性也在以下的信念與邏輯論述之中被建立 (Warren, 1990: 130)：

- (B1) 女性與自然、物理狀態較為接近，而男性則與「人」以及智能較為接近。
- (B2) 與自然、物理狀態較為接近的 (東西、人) 要比與「人」和智能較為接近的 (東西、人) 還要低等；或者相對而言，後者比前者還要高等。
- (B3) 因此，女性比男性還要低等；或者相對而言，男性比女性高等。
- (B4) 對於任何的甲和乙，如果甲比乙還高等，那麼甲便具有支配乙的道德正當性。
- (B5) 因此，男性具有支配女性的道德正當性。

正是在上述這兩組相同的壓迫性概念結構之下，人類對於自然的壓迫以及剝削利用，被緊密地與男性對於女性的壓迫與剝削連結在一起了(因此也才會有前述「開發處女地」之類的說詞)。

然而，在這兩組壓迫性概念結構中，不論是道德高下的宣稱，或是道德高下合理化支配、剝削關係的宣稱，都是立基與人類自我中心以及父權社會的建制；它們既是一種人類偏見的產物，也是人類特定歷史社會發展的產物，而不是一套放之四海皆準的律則。因此，Warren(1990)指出，女人與自然的被看待方式是一個基於歷史與社會建構的事實，而在父權體系下，女性被自然化、自然被女性化，而這兩者也同時被「男性優於女性、文化優於自然」的層級性與支配性邏輯附屬化了。生態女性主義者指出那些用來合理化性別、族群、階級的支配邏輯，同樣也是用在合理化人類對自然的支配，而這些個別的壓迫系統構成了彼此支持、援助的統整性壓迫系統。因此，對於性別壓迫的去除必須包含其它形式壓迫的去除，這也是為什麼一些女性主義者主張女性主義必須是結束所有形式壓迫的運動。就這點而言，生態女性主義的連結性別壓迫與自然壓迫，當然是提升女性主義的重要力量。同樣的，Plumwood 也指出，具批判性的生態女性主義代表著女性主義思想的更加提升，因為它將「自然」更清楚的含括在它的分析中，而「自然」便是影響著女性過去與現在受壓迫的關鍵範疇 (Plumwood, 1993: 39)。

本文作者認為，生態女性主義觀點與主張的確可以給女性主義帶來不同的視野與洞見。當然，一些生態女性主義學者也必須面對與小心避免她們在亟欲改變現狀的心情下容易落入的本質主義與二元論陷阱。此外，生態女性主義發展至今最大的困境便在於她們頗能正確地指出問題的根源所在，但是對於提出一套如何改變當前問題的整合性觀點卻往往束手無策。當然，這似乎也不單單是生態女性主義的困境，面對綿綿密密的父權體制與工業主義/資本主義時，女性主義與生態主義也是不易提出一套令人滿意而可行的整體策略，然而，這不改它們在某些面向可以對這些體制提出有效挑戰，並且能累積小勝利的成就。改革，似乎就從這些小成就開始。

五、代結論：拓展女性主義的生態女性主義

本文最後舉一個例子來討論生態女性主義觀點與主張如何能提出相當具有啓發意義的論點，而且可以實際進行研究的課題。

女性主義者長期以來關注於女性被分派擔任養育後代與其它家務勞動的工作的事實以及其後果，同時對於因應改變之道也有許多不同的主張（請參閱劉毓秀編，1997；王淑英、張盈，1999；林津如，2000）。針對此，生態女性主義者 Mellor (1997) 所提出的「生物時間」(biological time) 與「生態時間」(ecological time) 概念，可以有助於我們超越傳統上女性主義者在面對此課題時只處理性別不平等問題的侷限。「生物時間」指的是人類從事生物性生產、再生產活動的時間向度，「生態時間」則是指（有助於）生態循環、更新與演替的時間向度，這是人類延續生命與維持身體健康的非常重要向度。她指出在人類過去至今的歷史，女性擔負了絕大多數的「生物時間」，而在生計社會 (subsistence society) 以及許多農業社會的女性則同時需關照生態時間面向（直接從自然擷取資源，但又必須避免生態被過渡耗竭而導致食物來源短缺）。這樣子的結果，是讓男性有充足的「自由時間」可以進行各種社會、文化性活動，並靠此累積男性的資源與權力；但更重要的，女性的生物與生態時間之支出卻未能幫女性獲得應有的家庭、社會地位。這正如 Mies (1986) 所指出的現象：男性收穫不穩定但卻能累積男性地位的狩獵活動必須依附在女性穩固的採集活動之下才得以進行的，但後者的活動卻無法為她們獲得與男性對等的地位。

我們如果將 Mellor 的這兩個概念作進一步廣泛的解釋應用，作者覺得這對於理解當代台灣（以及許多其它社會）性別—生態互動下所產生的許多問題有許多的幫助。一如 Mellor 所指出的普遍現象，台灣的女性從過去到現在為家庭支付了主要的「生物時間」。而同樣在家庭內，各種「復原」(restoration) 的工作主要也

都是由女性來擔任的，這些「復原」工作主要包括：衣服、碗盤、屋子甚至小孩髒了必須回復到乾淨的狀態以備下次再來使用。這些「復原」的工作既是「生物時間」的一部份，也屬於「生態時間」的一部份，因為有了女性的這些勞動付出，衣服、用品等才能延續其使用價值，不致於對生態造成過多的負荷，甚至造成生態系統的大規模改變與破壞。當然，正如前文所提過，台灣女性的付出這些時間，也是讓男性得以有更多「自由」時間來累積經濟力（包括參與許多後/工業資本主義破壞自然生態，造成資源短缺環境破壞問題的工作）、社會文化資本與權力的基礎與原因；同時也是造成許多「女性勞動、男性運動」現象的主要原因。

然而，當愈來愈多女性也參與勞動市場之後，上述「生物時間」與「生態時間」並沒有重新被所有性別的家戶成員分攤掉了（我們暫時將討論的範圍界定於非獨居、非全由女人組成的家戶），許多女性繼續擔負過重的兩種時間付出之外，已有愈來愈多是透過兩種方式來解決這問題的：1）雇用其它地方的女性勞力來付出這些時間（如本地雇傭或非本國籍女傭）；2）減少復原工作的「生態時間」之支付，主要是透過使用大量「用過即丟」的日常用品。這些方式固然也使一些經濟能力較佳的女性得以如男性般的進行其它生產性、社會性工作與消費性、休閒性活動，並慢慢得也累積一些社會經濟權力，但是代價卻是由下列兩者來承擔。第一是由其它女人，尤其來自東南亞的外傭承擔，她們多數人生活在極度惡劣以及缺乏個人自主性的工作條件之下。其次是由大自然來承擔，透過資源更快速耗竭、廢棄物更加速累積來支付，主要來自生產與處理「用過即丟」物品所耗費的資源以及生產的廢棄物，但也包括當自己不必負責「復原」（如洗盤子）的工作時，往往較不熱中於物品的減少使用（用多少個盤子），一如住旅館時，我們往往會使用比平時更多的浴室毛、浴巾一般。上述第一項後果對於不平等的性別分工不但無法改善，而且更透過聯合種族、階級的壓迫性結構來深化與合理化此性別分工，因而分化了女性可以團結起來共同面對與試圖改變此壓迫性結構的可能性；這也構成了林津如（2000）所說的「女人之戰」。第二項後果則只會更強化這些人類對自然的剝削，深化此二者間的壓迫性結構，而最終，代價往往仍

是由女性的「生物時間」與「生態時間」（照顧因環境惡化而生病的小孩、老人，花更多得時間來進行各種長期性的自然環境復原工作）來支付。

作者必須強調，以「生物時間」與「生態時間」的概念來討論上述課題，絕非表示作者認為或主張女性因此應該繼續留在家庭裡從事「養育」與「復原」的工作。指出這些事項，為的是彰顯生態女性主義觀點所能提供比過去女性主義觀點更為周延的問題思考面向。同時，對於上述問題，本文作者從生態女性主義觀點的主張便不會僅是主張「家戶照顧工作社會化」（林津如，2000），而是如何促使男性、女性同時減少生產性/經濟性工作及休閒、消費性活動的時間，如此才能共同投注於家戶內的「生物時間」與「生態時間」相關工作。因為若非往此方向改進，則台灣社會必定會繼續走向前述「大地之母的陽剛化」之現象，包括生態的持續破壞以及將國內性別不平等問題拓展至 Mies 所說的國際性別分工不平等的問題。當然，這個課題仍有待更深入研究的進行，這並非本文在此想，或能夠繼續進行的。而隨著台灣的「家戶工作有給化」的立法工作積極進行，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也將更為凸顯；生態女性主義的觀點提供了有別與過往只關注於性別權力與分工的討論方向，而這樣的討論方向是試圖同時兼顧我們所生存的自然生態以及性別權力關係的。

從上述「生物時間」與「生態時間」的討論，作者認為生態女性主義的確能提供比過去女性主義觀點更寬廣的思考空間，以及同時處理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壓迫關係的路徑。畢竟，正如許多生態女性主義者所主張的，這些壓迫關係是相互支持的，有效的破解之道在於同時處理這些壓迫關係。

本文針對部分女性主義者對於生態女性主義的兩個主要質疑——二元論與本質主義，提出討論分析，主張上述兩個質疑雖然出現在少數生態女性主義學者的論述之中，但是並非生態女性主義的主要主張。作者從破除性別主義與物種主義的關懷出發，認為嚴謹的生態女性主義觀點與研究的確有助於擴展女性主義的視野與關懷，因為這兩者同屬相互支持的壓迫性結構。換句話說，女性主義者關懷人類對於自然的剝削與壓迫問題，將有助於性別解放的達成；相對的，生態主

義者關懷性別壓迫問題，也有助於自然的解放；這是為什麼生態女性主義者同時關懷這兩者的原因。

參考書目

王淑英、張盈（1999）〈托育工作女性化及相關政策檢視〉，《婦女與兩性學刊》，10：167-194。

成令方（1990）〈大地之母的力量與迷思〉，《當代》，48：88-93。

李常卉（2001）〈生態女性主義論西方文化傳統中的女性與自然〉，《鵝湖學誌》，27：137-176。

李慧權（1991）〈婦女與環境：生態女性主義的省思〉，《婦女與兩性學刊》，2：113-141。

林津如（2000）〈「外傭政策」與女人之戰：女性主義策略再思考〉，《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9：93-151。

葉為欣（1998）《生態女性主義的理念與實踐：探討台灣經驗》，國立中興大學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馮慧瑛（1999）〈自然與女性的辯證：生態女性主義與台灣文學/攝影〉，《中外文學》，28（5）：78-103。

劉毓秀編（1997）《女性，國家，照顧工作》。台北：女書。

顧燕翎（1996）〈生態女性主義〉，收於顧燕翎主編，《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261-282，台北：女書。

Biehl, Janet. (1991) *Rethinking ecofeminist politics*. Boston: South End Press.

Chomsky, Noam. (1993) *Year 501: The conquest continues*. Boston: South End Press.

Collard, A. with J. Contrucci. (1988) *Rape of the wild: Man's violence against animals and the earth*. London: The Women Press.

Cook, Alice and Gwyn Kirk. (1983) *Greenham women everywhere: Dreams, ideas and actions from the women's peace movement*. London: South End Press.

- Cuomo, Christine J. (1992) Unravelling the problems in ecofeminism. *Environmental Ethics* 14: 351-63.
- de Beauvoir, Simone. (1952) *The second sex*. New York: Vintage.
- Fanon, Frantz. (1989) On national culture. In 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 (Eds.) *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a reader* (pp. 36-52). 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
- Fox, Warwick. (1989) The deep ecology-ecofeminism debate and its parallels. *Environmental Ethics*, 11 (1): 5-25.
- Gaard, Greta. (1993) Ecofeminism and native American cultures: Pushing the limits of cultural imperialism? In Greta Gaard (ed.) *Ecofeminism: Women, animals, nature* (pp. 295-314).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Gottlieb, Robert. (1993) *Forcing the spr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environmental movement*.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 King, Ynestra. (1989) The ecology of feminism and the feminism of ecology. In Judith Plant (ed.) *Healing the wounds: The promise of ecofeminism* (pp.18-28) Philadelphia: New Society Publisher.
- Li, Huey-li. (1993) A cross-cultural critique of ecofeminism. In Greta Gaard (ed.) *Ecofeminism: Women, animals, nature* (pp.272-294).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MacCormack, Carol P. (1980) Nature, culture and gender: A critique. In C. P. MacCormack and M. Strathern (eds.) *Nature, culture and gender* (pp.1-2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ellor, Mary. (1992) *Breaking the boundaries: Towards a feminist green socialism*. London: Virago.
- Mellor, Mary. (1997) *Feminism and ecolog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Merchant, Carolyn. (1980) *The death of nature: Women, ecology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 Mies, Maria. (1986) *Patriarchy and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London: Zed Books.
- Milton, Kay. (1996) *Environmentalism and cultural theory: Exploring the role of anthropology in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London: Routledge.
- Naess, Arne. (1973) The shallow and the deep, long-range ecological movement. *Inquiry* 16: 95-100.
- New, Caroline. (1996) Man bad, woman good? essentialisms and ecofeminisms. *New Left Review* 216:79-93.
- Orenstein, Gloria Feman. (1990) *The reflowering of the goddess*.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 Ortner, Sherry. (1974) Is female to male as nature is to culture? In M. Z. Rosaldo and L. Lamphere (eds.) *Woman, culture, and society* (pp.67-8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Plumwood, Val. (1993) *Feminism and the mastery of nature*. London: Routledge.
- Salleh, Ariel Kay. (1983) Deeper than deep ecology: The eco-feminist connection. *Environmental Ethics* 6: 339-45.
- Senghor, Leopold Sedar. (1993) Negritude: A humanism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 (eds.) *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A reader* (pp.27-35). 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
- Shiva, Vandana. (1989) *Satyng alive: Women, ecology and development*. London: Zed Books.
- Shiva, Vandana. (1993) Masculinization of the motherland. In Maria Mies and Vandana Shive (eds.) *Ecofeminism* (pp. 108-115). London: Zed Books.
- Spretnak, Charlene. (1989) Toward an ecofeminist spirituality. In Judith Plant (ed.) *Healing the wounds* (pp.127-32). Philadelphia: New Society Publishers.
- Spretnak, Charlene. (1990) Ecofeminism: Our roots and flowering. In Irene Diamond

and Gloria Feman Orenstein (eds.) *Reweaving the world: The emergence of ecofeminism* (pp. 3-14). San Francisco: Sierra Club Books.

Sturgeon, Noel. (1997) *Ecofeminist natures: Race, gender, feminist theory and political action*. London: Routledge.

Warren, Karen J. (1990) The power and the promise of ecological feminism. *Environmental Ethics* 12: 126-146.

Zimmerman, Michael E. (1987) Feminism, deep e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 *Environmental Ethics* 9: 21-44.

Abstract

Since the 1980s, ecofeminism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and critique of both western environmentalists and feminists. To the former, ecofeminism obscures the reality of human-nature domination, while to the latter, ecofeminist thought has a tendency toward dualism and essentialism.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first to show that the critique of ecofeminism for its tendency toward dualism and essentialism is not sustained. Secondl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by trying to make clear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peciesism and sexism, ecofeminism can take feminism a step forward in dealing with this mutually reinforcing oppressive social system. Finally, this paper applies the concepts of biological time and ecological time to demonstrate the utility of ecofeminist thought in feminist thinking.

Keywords: ecofeminism, sexism, speciesism, patriarchy, biological time, ecological time